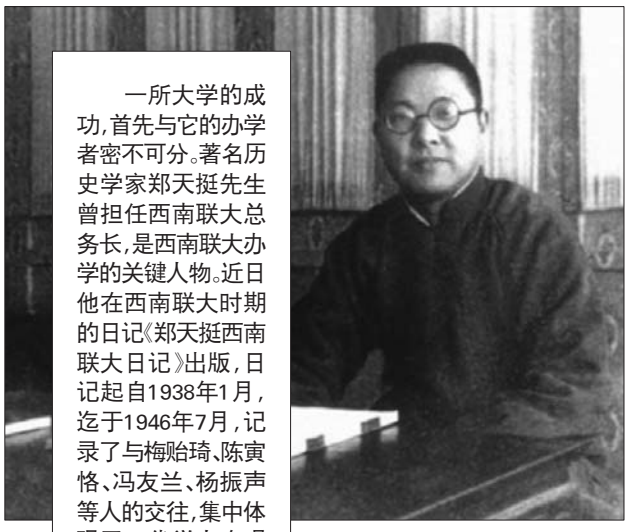

一所大学的成功，首先与它的办学者密不可分。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曾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，是西南联大办学的关键人物。近日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出版，日记起自1938年1月，迄于1946年7月，记录了与梅贻琦、陈寅恪、冯友兰、杨振声等人的交往，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。

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出版

再现一代学人的刚毅坚卓

□刘宜庆

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
郑天挺　著
俞国林　点校
中华书局

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。西南联大又一次成为文化热点。而电影《无问西东》的热映，也成为回望西南联大的一个契机。

西南联大堪称绝代风流。这风流在我看来，包含了人格独立、敢于批判的铮铮风骨；弦歌不绝、为人师表、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；沉潜专注、甘于奉献、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。西南联大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，那些特立独行、放浪形骸、个性卓异之士，才华与激情四射，谱写了一曲并不遥远的绝唱。

>> 联大运转细节里的教授风度

联大教授的风度最令人心折低回。像郑天挺、黄钰生、李继侗等教授在联大先后担任过多种职务，为学校服务，担任的职务没有任何报酬津贴，但他们乐于奉献。

1938年文法学院从蒙自回到昆明，教学秩序正常后，郑天挺就向蒋梦麟校长提出辞去行政职务，专攻学问，蒋表示理解。当时，郑天挺曾请魏建功代刻杖铭二根，其一曰“指挥若定”，另一曰“用之则行，舍则藏”。罗常培见后，以“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”相讥，暗指郑坚辞不任行政职务。“斯人不出，如苍生何”，在冯友兰、杨振声等多位教授的劝说下，郑天挺出任联大总务长，一干就是八年。除了这个任务繁重、工作繁琐的职位，他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一职。

有记者采访我，提到西南联大最先想到哪几位教授？第一位，梅贻琦。西南联大的船长，清华终身校长，寡言君子，他代表了西南联大的风度。第二位，郑天挺。身兼数职，默默奉献。他体现了联大校训“刚毅坚卓”之精神，代表了西南联大的风范。第三位，吴宓。《吴宓日记》中有三多：恋情多，校花多，八卦多。他代表了西南联大的风流。

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虽然没有吴宓日记中的八卦，但史料价值更大。因日记从长沙到昆明，再到北平三校复原，日记记录非常完整。又因郑天挺担任多种职务，所记涉及西南联大的运转，是研究西南联大的必读书籍。

郑天挺是联大总务长，被称为“大管家”，管理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，各种工作、人事的纷繁错杂，须有超越常人的耐心和毅力。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、宿舍的建设与管理、岗位的设置与变动、教工的安顿与调动、学生的招收与教育……诸端，均须一一过问。特别是后来在资源匮乏、物价飞涨的情况之下，如何正常发放工资，如何合理地核算生活补助，都是关涉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。有一次，总务处发工资不及时，拖延了一个上午，作为总务长，郑天挺很生气。因为他知道，联大教授同仁生活陷入困顿之中，有的债台高筑，耽误一个上午也不行。

按照联大规定，担任总务长后可以不用教学，但是郑天挺坚持承担教学任务，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，晚间还得拼命读书，以备第二天之讲授。如1941年1月29日日记：**用菜油灯灯草三根，读《明史》至十二时，目倦神昏，始寝。盖明日须讲述，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。**

郑天挺除讲授《明清史》等课程，并继续进行清史研究，完成并出版了《清史探微》等重要著作。他一身兼任多种职务：担任北大的秘书长和文科研究所副所长。由于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长期住在重庆，北大和文科所的事务实际上由他主持。1939年5月31日日记中写道：**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，于学术外，注意人格训练，余拟与学生同住。**

教学之余，西南联大教授衣食住行、娱乐休闲等，都可以在郑天挺的日记中找到生动、细腻的记录。这些记录，对于研究全面抗战时期学者的生活史，大有裨益。仅从教授如何吃饭这个问题来看，随手翻日记，就可找到答案。

日常的吃饭方式有食堂和包饭。首先是食堂。学校当然有食堂，去食堂吃饭或许是师生们最常选的一种方式。郑天挺先生的日记里也写到去食堂吃饭，“至平津小食堂食面”、“十二时偕矛尘、汇臣至西南食堂午饭”、“十二时在友谊食堂食炒饭一盂”、“雪屏来，同至昆华食堂食鱼”。吃食堂之外，还可以包饭。1942年7月1日日记记载：“今日起复加入靛花巷公舍饭团。”所谓包饭，就是请厨工上门包一段时间的伙食。教职工住在一起，大家一同包个小厨房，按月结账，定个几荤几素的标准，保证基本的营养。

总之，在物价尚未飞涨之前，教授们的饮食还有保障。后来，物价飞涨，百物巨贵，教授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，到了“饭甑凝尘腹半虚”、“既典征裘又典书”的窘迫境地。郑天挺的日记就记录了他自己洗衣服洗破手、缝补衣服。

正是种种教学和生活细节，让战火纷飞的岁月可以触摸，有了温度，也感受到联大学者的风度。

1943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纪念留影（前排左一孙毓棠，左二郑天挺，左三噶邦福，左四雷海宗，左五吴晗，二排左一何兆武）

郑天挺夫人周稚眉和五个子女

读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，我感受最深的是，郑天挺那一代学人的“刚毅坚卓”。不妨从其家事为观察视角，进入郑天挺的内心世界。

郑天挺是福建长乐人，出生于官宦世家。父亲郑叔忱是光绪十六年进士，长期在翰林院任职，后在京师大学堂（即北京大学前身）任教务提督（教务长）。郑天挺在北京大学求学、执教，做过北大的秘书长、副校长。父子两人都在北大执教，堪称一段学林佳话。

>> 家事国事交织，家难国难不离

虽然出生于官宦世家，但一生命运多舛，死亡的阴影从童年就笼罩着他。6岁时父亲去世，7岁时母亲去世，即寄养到姨父母家，由表舅梁巨川先生监护，并由表兄张耀曾（民国大律师）、张辉曾对其进行教育。

1930年11月，郑天挺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，才算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。此时，郑天挺的家庭生活圆满幸福。她的夫人周稚眉也融入了北大教授夫人的生活交际圈。

然而，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1937年2月10日，农历大年除夕那天，全家人正准备欢度春节，周稚眉突然肚子痛。家人将其送到医院住院，谁知动手术时，发生医疗事故，意外去世。周稚眉撒手西去，留下五个孩子，最大的13岁，最小的才5岁。

家难未平，国难方殷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全面抗战开始。作为北大的秘书长，在危难之中，郑天挺堪称北大的中流砥柱，组织教授南渡。

二十六年今日，倭虏启衅，其年冬，余将北平北大诸事结束，并协助教授同人南下，资遣职员同人及工友毕，余遂只身南下，留儿辈于北平。（1946年7月7日）

至于二十六年冬，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，一一叩门送钱，告以天津接头地址。（1946年7月14日）

1937年11月17日，郑天挺告别五个年幼的孩子，与罗常培、罗庸、魏建功等教授同车赴天津南下。暂驻足长沙，后辗转到昆明，一直到抗战胜利后，才回到北平，与儿女团聚。“万里孤征心许国，频年多梦意怜儿。”这诗句传递出郑天挺的家国梦。

1943年8月14日，大女儿郑雯由北平远道来昆明读大学，父女在昆明街头相见，“一时悲喜交集，泪欲落者屡矣”。此后，郑天挺对大女儿的关心与照顾，流露在后来日记的笔墨之间，让人看着都感到温暖。即使犀利的空袭警报响起，联大师生跑警报时，郑天挺在汹涌的人潮之中，一眼就能看到女儿郑雯的身影，感到内心是如此踏实。

抗战胜利后，郑天挺的生活又发生一系列变故。死亡的阴影再度出现。1946年7月12日，郑雯在上完西南联大外文系三年后，于北上复校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，时年二十三岁。

郑雯遇难，这噩耗传来，郑天挺的日记记录了这艰难的时刻，这一天是1946年7月14日：

下午欲睡不能，两次登榻，三次倚枕，一瞬即醒。王世仪来，以其家刻书籍为赠，强阅之。比晚再取报纸读之，玩其语意，绝难幸免，悲伤之馀，弥增悔痛。余若不为接收先回，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。孟真以五月四日来平，余若早以回平飞机事询明告之，绝不致使其搭车赴沪。儿以六月十□日到沪，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，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。天乎！命乎！至于二十六年冬，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，一一叩门送钱，告以天津接头地址，而此次雯儿在昆，无人照料，余固不敢以怨也。九时余让之衔父命来相慰。上午六哥来，下午君坦、公渚来，久谈，均不知此事。十二时大风雷雨，灯灭就寝。

隔着70多年的时光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郑天挺内心的懊悔、悲痛与绝望。他以刚毅坚卓的精神，承受着人世间的一切苦厄。娑婆世界，人生实苦，所有苦难，莫过于亲人亡故。而郑天挺遭遇的特别多。他的家事与国事交织在一起，家难与国难不可分离。

度过了这么多的劫难，经历了这么多的死亡，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在这一天戛然而止。丧女之痛让他无心再写日记，停止了五年之后，获得新生的郑天挺又开始写日记。

1951年6月9日，郑天挺在日记本上专门题一句：“自雯儿之亡，久停日记。日月如驶，新生请自今始。”

我们期待着郑天挺五十年代的日记出版。

□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
□本版编辑：曲鹏
□设计：壹纸工作室
□美编：马晓迪